

書 評

王 學 深^{*}

Shuang Chen 陳爽

State-Sponsored Inequality: The Banner System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Northeast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368 pages. ISBN 9780804799034

五十多年前，(美)格爾哈特·倫斯基(Gerhard E. Lenski)在《權力與特權——社會分層的理論》(*Power and Privilege: A Theory of Social Stratification*)一書中雖然沒有包含對清代「旗一民」這種人為製造的「族群」研究，但是作者對於「種姓」和「等級」的定義在一定程度上與下文談及的旗人精英階層和旗民的分野具有高度的重合性，他認為這一群體最大分層特點就是：進出這些群體的流動在實際上是不可能的。¹當這個特權的階層擁有法律賦予的特權時，這個階層就形成了不平等的等級。除了政治、法律擁有特權外，隨之而來的這一群體也相應的享有經濟分配優勢。然而格爾哈特·倫斯基的社會分層理論更多是基於歐美社會歷史研究

2018年7月5日收稿，2019年6月24日修訂完成，2019年7月11日通過刊登。

* 作者係中國政法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研究所講師。

Wang Xue-shen, Assistant Professor, Institute of History,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1 (美)格爾哈特·倫斯基(Gerhard E. Lenski)，《權力與特權——社會分層的理論》(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頁97；英文原著係於1966年出版。

所得，東方的情況則被忽略。

那麼，東方的社會分層情況如何？聚焦到中國歷史中又有什麼特點？在清代具有特色的「旗—民」雙軌體系下社會分層又如何體現？最近出版的《國家支持的不平等——中國東北的八旗制度和社會分層》（*State-Sponsored Inequality: The Banner System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Northeast China*）一書則回答了這些問題，特別是該書以清代的東北雙城（今中國黑龍江省哈爾濱市雙城區）旗人移民社區的建構回答了格爾哈特·倫斯基在他的書中所提出的社會分層理論的核心問題，即「誰得到了什麼？為什麼會得到？」²

本書作者為美國愛荷華大學歷史系副教授陳爽（Shuang Chen）。她以雙城作為研究焦點，以從京城和其他地區遷移至此的旗人作為研究對象，討論在清朝國家政策的「刻意」制定與支持下，創造了旗人移民社群內，在十九世紀二十年代至民國初年社會地位、土地分配、財富累積等方面的不平等狀況和社會等級的形成過程。

在清政府照顧「京旗」（包括京城旗人和熱河旗人）的政策之下，京旗旗人移民可以得到遠多於屯丁旗人的土地份額，並可以由此轉化為更多的社會財富。清政府的這種著力劃分階層等級的政策，是為了保證京旗旗人的精英地位的精心設計，也確實在清代統治下塑造了「雙城京旗旗人（metropolitan banner）—屯丁旗人（rural banner）—浮丁旗人（floating banner）—民人（civilian）」由上而下的等級體系，在很大程度上體現了國家在改變地方社會上的能動性。而雙城這種由國家創造的社會分層結構，在作者看來是雙城自移民政策制定以來直到民國初年，維繫京旗旗人始終處於金字塔頂端的重要原因。換言之，國家制定的不平等政策是維繫了社會分層，而不是讓權力、財富變得更加具有流動性和集中。

但隨著時間的推移，作者也認為朝廷控制力的下降和地方能動性增強，使得旗人間的那條界限也變得模糊不清，處於最高階層的京旗旗人越來越多受到來自地方其他階層人的挑戰。在這一方面，作者也論述了雙城

2 同上註。

社區內旗產的流轉，蘊含了對於財產有限流動性的討論。

全書共分八章和一個尾聲部分。作者在第一章緒論部分介紹了雙城地理位置和國家所制定的移民政策，講述了八旗制度和社會分層理論，特別是作者以國家在雙城制定的不平等制度與中國現代社會中的戶口制度作比較，以城市戶口和農村戶口類比雙城社區。並在接下來的寫作中，作者將書寫分為兩個部分。

在第一部分（第二至四章）對雙城移民社會給予了概括性研究，強調在 1810 年代至 1850 年代內國家不平等的分層移民政策的制定與實施過程，以及國家權力在雙城社區內鞏固和維護分層制度的努力。具體而言，第二章討論了朝廷、吉林將軍和相關官員對於旗人移民雙城的規劃，旗人的招募，耕地分配的設計，朝廷對移民旗人的財政資助，土地授予與定居情況，以及政府管控等方面內容，給讀者從總體上勾勒出雙城旗人移民的歷史概貌。

第三章作者認為旗人移民雙城，不僅是清政府為了讓旗人維持生計的一種措施，更是保持京旗旗人和屯丁旗人精英地位的一種努力，這一點在雙城的土地分配政策上尤為突出。在這一設計下，雙城的資源配置自然而然造就了精英與非精英階層，以及精英階層內部的差異（旗人佔據土地高達 72%，浮丁旗人占 9%，民人占 17%，未知身分 2%，頁 87-88）。這種差異是國家刻意在不同階層群體之間人為劃出的鴻溝。

第四章作者描繪了雙城旗人移民的四個階段：第一階段在 1815 至 1823 年間，京旗旗人尚未遷移至雙城，而屯丁旗人已經不斷遷移至此並建立起認同；第二階段是 1824 至 1829 年間，京旗旗人的到來和土地優先撥給，引發了旗人間的矛盾和張力；第三階段是 1830 年代至 1840 年代，雙城移民社會不斷完善和鞏固。例如，地方管理機構的建設、村廟的設立和城信仰的出現；第四階段為 1852 年後朝廷對於雙城的管控機制的改革。例如，選官系統和登記納租金的施行，強化了政府對旗人移民社會的監管。

第二部分（第五至第八章）作者檢視了 1840 年代至民國初年（1910 年代）雙城社會階層的建構和維繫的過程和採取的一系列措施。第五章作

者強調雙城旗人社區的建立和逐步完善的具體方面。例如，在地方逐步形成了「總屯大一屯大一兩個十家長」的非官方體系；村廟的建立、對於九神崇拜，和以家為單位的祭祀活動，在精神層面促進了旗人社區的構建；公用土地的使用（如墓地和牧場）以及土地的轉賣制度的逐步完善等。

第六章側重對京旗旗人的討論，強調了這一群體再塑等級優勢的努力。在雙城這個旗人移民社區內，家族組織薄弱，族譜編寫也起步較晚，而導致這種狀況的原因在於以下三點：雙城社區內的定居形態、八旗自身高度的組織性、國家所制定的土地分配政策。（頁 164）相對於屯丁旗人移民而言，京旗旗人缺乏可以擴展的家族關係網，因此導致了雙城非宗族組織的發展，為京旗旗人生活提供了支援和補充。隨著雙城社區的逐步完善，移民於此的京旗旗人逐漸分化成兩大類：第一類是通過國家制定的不平等土地分配政策和權力優勢，得以繼續保持這種優越地位，並憑藉於此積累了財富。例如，原屬滿洲鑲黃旗的京旗花連太家族，通過優勢地位不斷的發展與維繫過程；第二類是逐步趨於衰落與消亡（截止到 1869 年，消亡的京旗旗人多達 225 戶，頁 167）。

第七章作者集中分析了 1870 年和 1906 年土地分配模式，解釋了國家制定的社會等級分層模式是土地分配得以穩定的重要原因。正是因為京旗旗人保持了在土地佔有率上對屯丁旗人的優勢，且除了土地佔有率上的優勢以外，京旗旗人所享有的政治優勢地位和國家相應制定的土地轉讓政策，都鞏固和確認了雙城社區內分層模式的合理性。

第八章作者討論了社會分層狀況一直延續到民國初年，這種分層不僅強化著各階層的身分認同，同時也隨著清朝的覆亡而加劇了社群內的衝突。尾聲部分，作者再次以清代雙城分層模式的建構與戶口制度相比較，既為全書的結尾又呼應了緒論部分。

作者以詳實的史料描述了雙城自十九世紀上半葉至民國初年的旗人社區的建構過程。全書中，作者共有引用註釋 563 處、9 處圖形表格、2 份地圖和 18 個資料圖表，體現了作者對於歷史統計研究方法嫺熟應用和扎實的學術功底，這些特點與作者加入李中清、坎貝爾等人研究團隊，並多次合作發表文章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繫。

在理論運用方面，作者將雙城的旗人移民社會的建構放在三個領域之內：首先，作者將研究重點聚焦於社會不平等、社會分層和國家工程等為代表的社會學理論領域。在這一部分作者側重如巴倫和比爾拜（Baron and Bielby, 1980）、³ 查理斯·蒂利（Tilly, 1998）、⁴ 布勞（Blau, 1994）、⁵ 王豐（Wang, 2008）⁶ 等關於社會不平等的理論範式，尤其強調了蒂利的「持久性不平等」（durable inequity），即當歸屬特徵如性別、膚色等變為基本社會屬性分類標準後，不同屬性人群間的界限便會成為持久性的（Tilly, 1998，頁 1-40）。在本研究中，旗人不同的身分地位則變為了這種持久性不平等的根本要素；作者對於國家工程的討論方面，強調了這些國家工程和政治系統與意識形態息息相關，這是以斯科特（Scott, 1998）⁷ 對當代國家工程理論研究為基礎，認為「強大的自信基於科技的發展和產品的擴張」（Scott, 1998，頁 4），作者正是利用這一個理論，從當代研究中抽離出來，並回溯十九世紀二十年清代國家工程的構建過程。

其次，是對於八旗精英、旗民分野的歷史學領域的研究。在這一領域內，作者更多強調了旗人社群的建構與認同研究，並藉由柯嬌豔（Crossley, 1990）、⁸ 歐立德（Elliott, 2001）、⁹ 路康樂（Rhoads, 2000）、¹⁰ 定宜莊

3 James N. Baron and William T. Bielby, "Bringing the Firms Back in: Stratification, Segmentation,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Work,"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5.5(1980.10): 737-765.

4 Charles Tilly, *Durable Inequali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5 Peter M. Blau, *Structural Contexts of Opportuniti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6 Feng Wang, *Boundaries and Categories: Rising Inequality in Post-Socialist Urban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7 James C. Scott, *Seeing Like a State: How Certain Schemes to Improve the Human Condition Have Faile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8).

8 Pamela Kyle Crossley, *Orphan Warriors: Three Manchu Generations and the End of the Qing World*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9 Mark C. Elliott, *The Ma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10 Edward J. M. Rhoads, *Manchus and Han: Ethnic Relations and Political Power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1861-1928*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3)、¹¹ 趙令志(1999; 2001)¹² 等人研究為支撐。應該注意的是，這些學者一方面強調了「旗—民」或者「滿—漢」分野，另一方面討論了旗人內部的階層劃分。本書側重對同為移民旗人群體內的「京旗旗人」和「屯丁旗人」的分層研究，與後一種研究思路相近，但又有所突破，強調了在一個全新的移民環境內，國家政策對於旗人群體內社會分層的再造與維繫。此外，作者也注意到了定宜莊、刁書仁和魏影等學者曾對於乾隆初年京旗回屯拉林問題的研究。這次發生在乾隆初年並不成功的旗人移民的個案，為作者對於雙城旗人社區的研究提供了這種國家行為在十八世紀的參照。

最後，是對於雙城歷史調查和人口統計研究層面的領域。在這一層面內，作者以李中清和王豐(Lee and Wang, 1999)、¹³ 坎貝爾和李中清(Campbell and Lee, 2002)、¹⁴ 刁書仁(1993)¹⁵ 等研究為主要引用對象，同時得益於包括作者在內，由王洪波與陳爽主導，倪志宏、董浩、李中清與康文林等人參與建立的「中國雙城多代人口資料庫」(CMGPD-SC)的支撐。雖然一些學者已經關注到了東北地區旗人移民或旗地研究，但是對於雙城社區，作者具有突破性貢獻。由以上三個領域可以顯示出，作者對於雙城旗人移民社區的研究並沒有局限在某一單一的領域內進行，而是力求用跨領域的研究方式，將歷史學、社會學、人類學等多學科進行融會貫通。正是有了資料、史料、理論和田野考察等多層次的支撐，作者對於上文所提及的雙城從清至民國初年的演進過程的研究令人信服。

2000).

11 定宜莊，《清代八旗駐防研究》(瀋陽：遼寧民族出版社，2003)。

12 趙令志，〈京畿駐防旗地淺談〉，《清史研究》1999.3(1999.9): 23-30。趙令志，《清前期八旗土地制度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

13 James Z. Lee and Feng Wang, *One Quarter of Humanity: Malthusian Mythology and Chinese Realities, 1700-2000*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14 Cameron Campbell and James Z. Lee, "State Views and Local Views of Population: Linking and Comparing Genealogies and Household Registers in Liaoning, 1749-1909," *History and Computing* 14.1-2(2002.3): 9-29.

15 刁書仁，《東北旗地研究》(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

當然，筆者認為該書還有一些問題存在進一步討論的空間：

第一、關於旗人分層和當代戶口制度的比較。在緒論（頁 4-5）和尾聲（頁 251-253）部分，作者都認為社會分層不僅是十九世紀雙城社區內的特徵，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也有類似的特點，（頁 4）而其中戶口制度就是典型代表。雖然作者自己也承認這樣的比擬有所欠缺，但依舊認為兩者具有相似的可比性，但就筆者看來，二者似乎並不在一個可以比較的維度之內。

清代的旗人本身就是具有特權的階層，在「首崇滿洲」的大政策下，將「京旗旗人一屯丁旗人一浮丁旗人一民人」縱向建構成雙城的分層特點，只不過是將原有的政策平移至此，換句話說，清代分層制度是朝廷認可的，以特權為基礎的由上而下的階層分級體系。然而，1958 年以後的戶口制度則是社會橫向兩種身分的分類。在戶口劃分政策的制定上，國家並不存在城市戶口擁有者在社會地位、政治權力、法律特權和經濟從屬性上（雖然城市戶口在物品分配上具有優勢）必然優於農村戶口的國家設計，而城市戶口更不是特權階層，反之京旗旗人卻正是如此。但是，作者卻截然將城市戶口擁有者視為精英的代表（頁 253）與農業戶口作為非精英截然分立。

即使我們退一步假設，雙城旗人分層制度和戶口制度可以比較，作者也只是籠統的提出這種比較概念，而沒有具體指出城市戶口與農業戶口的具體類比對象。城市戶口是對應京旗旗人，還是旗人這一整個群體？農業戶口的不平等地位指的是屯丁旗人相對於京旗旗人，還是民人相對於旗人群體？這些具體問題作者沒有給出具體的答案，似乎尚有改進的空間。

第二、在於旗人內部的族群劃分方面。作者在書中（頁 55-56）提及了京旗移民主要以八旗滿洲和八旗蒙古為主，而屯丁旗人內則涵蓋八旗滿洲、八旗蒙古、錫伯、八旗漢軍、胎蠻子、巴爾虎等六大族群。那麼，首先應該提出疑問的是，對於由京旗遷至雙城，國家所給予他們更多的土地，是一種國家分層設計還是一種補償？正如我們所知，八旗內部基本上形成了「滿洲—蒙古—漢軍」的分層等級體系，而讓處於更加優勢地位的滿洲和蒙古旗人遷移至雙城本身就需要豐厚的補助條件，同時保障他們依

舊處於比漢軍和其他族群旗人更具優勢的地位，由此看來，土地分配政策更可能是一種經濟補償。其次，作者對於「京旗移民—普通移民」的分層研究需要進一步做補充或說明，即是否屯丁旗人類別內的滿洲旗人，在雙城擁有和京旗旗人類似的經濟、政治地位與話語權。如果二者相類似，分層的理論設計則會被削弱，理論走向轉變為了朝廷保持八旗內部等級（滿洲—蒙古—漢軍）的努力，而並非著力塑造「京旗旗人—屯丁旗人—浮丁旗人—民人」的社會分層的設計。如果二者並不類似，作者的社會分層理論則會更加充分，但需要作者對這一點給予重視，做進一步的研究與比較。

第三、除了以上兩個部分可以做進一步延伸的研究和討論外，作者可能還有一些可以調整的地方。例如，在第八章作者的立意和標題「在民國初期社會的形成」是希望討論民國初年雙城旗人分層延續和衝突問題，但是卻用了更多的篇幅（頁 225-240）依舊討論清代時期雙城京旗與屯丁旗人的衝突，以及 1829 年的政策調整，與題目顯得有些出入，也給人與前文重複之感，而真正談及民國時期雙城社會發展只有數頁。（頁 241-247）此外，在第六章討論了京旗旗人的社會轉型，將社會分層轉化為財富和地方社區內的權力，並將這一轉變納入十九世紀國家權力衰落和地方社會權力上升的理論中。（頁 6、181）作者在緒論的註釋 7 中，（頁 6）引用了孔飛力（Kuhn, 1980）、¹⁶ 羅威廉（Rowe, 1984 and 1992）、¹⁷ 冉枚鑠（Rankin, 1986）¹⁸ 等人的研究，顯然意圖將雙城和江南、浙江、漢口等納入了同一軌道之內。但筆者認為，將雙城旗人社區和十九世紀江南、東南、華南等地方精英能動性的上升相比有失偏頗。清朝權力衰落對雙城這一「滿洲故土」到底有多大影響？作為旗人故土的東北是否可以與處於南方，漢人精

16 Philip A. Kuhn, *Rebellion and Its Enem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Militariza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1796-1864*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17 William T. Rowe, *Hankow: Commerce and Society in a Chinese City, 1796-1889*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William T. Rowe, *Hankow: 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 1796-1895*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18 Mary Backus Rankin, *Elite Activism 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Zhejiang Province, 1865-1911*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英能動性更強的地方等量齊觀？這些問題需要考慮。

雖然一些地方還有討論空間，但作者扎實的史料功底和對西方前沿理論信手拈來的學術素養，凸顯了作者中西融合的學術背景。對於雙城的研究不僅為我們提供了一種社會分層的研究視角，更是一種力圖突破單純歷史學，融入社會學和人類學研究的有效嘗試。正是在這種嘗試之下，作者為我們呈現了一部優秀且令人信服的雙城旗人社區建構的歷史學著作。

